



月光水井

人类啊！相爱吧，
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
向着同一的归宿。
——冰心



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典藏作品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目录

小说	1
钟声回荡	1
月光水井	13
过河听戏	33
临时工	56
弯曲的杨树	100
亚麻色头发的女郎	113
散文	125
鹧鸪住在哪里	125
那个夏天梦会飞	133
童话	138
钟声	138
丢失的星期天	141
你用心爱过一朵花吗	146
高楼里的树林和我的熊邻居	156
幼儿文学	160
爱读童话故事的书	160
诗歌	162
诗，在大自然	162

小说

钟声回荡

林彦

一

那颗 1938 年射向他的子弹一直在他耳边呼啸着，谁也没料到四十九年后竟会骤然将他击中。

整整四十九年，席先生耳边从不间断地流淌着无数声音，风声雨声歌声喊声掌声桨声汽笛声……唯有那颗子弹的呼啸却始终是无处不在的，不时把他的记忆咬得一痛，让他神经抽搐，呼吸变得沉重而急促——就像 1987 年 4 月 29 日，他盯着一张报纸，四十九年前的硝烟、刺刀和鲜血重新在他眼里闪来闪去，耳边枪林弹雨，还有杀人的狂笑与凄厉的哭嚎。席先生的牙齿咬得“嘣”的一响，密封在心灵深处的往事顿时血浆喷涌。他的手指死死地抠着报纸，拼命挣扎着想站起来，两条腿却更剧烈地抽搐着。

外婆说当时真的不知道他在发抖，在发抖哦。

那天对于外婆并没有什么不同，顶多只是清晨的雾浓一些。外婆照例走进浓雾里清扫街道，出门准时碰到席先生在窗下做广播体操。席先生住在外婆的木阁楼下面，日子长了，外婆对席先生的活动日程了如指掌：做操、买菜、读书、午睡，偶尔去校园走一圈，等弄堂拐角那盏路灯亮起来，只要不下雨席先生就坐在路灯下看报纸，边看报纸边听收音机。外婆耳背，席先生欣赏的内容她一无所知，不过她知道播完新闻关上收音机肯定是晚上八点，一分一秒也错不了。

这个傍晚席先生依旧靠在躺椅上看报纸，黄昏的紫光已悄悄褪去，巷子里飘来煤油炉炒菜的味道。路灯投下一团光晕，把无雨的天气也弄得朦朦胧胧。外婆在潮湿的厨房里煮粥，一个硬币从她围裙兜里抖落出来，外婆蹲下来忙碌了很久，始终没有搜到暗角里有金属的光泽。等她直起腰才发现路灯莫名其妙地熄了，席先生还无动于衷地仰坐着，摊开的报纸在暗夜里像一张含糊而僵硬的脸。

睡着了？外婆边嘀咕边下楼看个究竟。席先生看过的报纸大多会送给她当废品，外婆大概企图挽回那个硬币的损失，拧上收音机就习惯去收席先生手里的报纸：“还看还看，路灯摸黑晓得勿……”

借着巷口一抹淡黄的灯影，外婆脸上突然出现不可思议的表情，片刻后整个文林街都听到外婆语无伦次的惊叫：“哦哟不得了，快快快，完了，席先生不行了！”

人群围上来的时候，天已经黑得很厉害，漏出一点星光和风。席先生双目紧锁，眼角的皱纹无比深刻，神情一如他惯有的严肃。医院的急救担架挤了进来，一个套白大褂的医生抓起席先生的手试试体温和脉搏，摇摇头，用一个最简单的动作结束了一个人六十八年的一生。

二

他不是我的老师，但是每年都坚持到学校来给我们上一课。

那一天我还在栖镇中学念初二。听校工老罗说，席先生去世的那一刻，他听见操场槐树下的那口大钟突然沉闷地一响，而当时操场上根本没有人。

大家正为老罗的传言是否可信争辩不休，班上的宋团支书沉重地宣布，原定五四青年节全体团员去城北荒丘的计划临时调整，因为席先生已经不在了。

我们静默了片刻，表情却松弛下来，总算可以不去城北了。差不多每年五月我们都要被席先生动员起来去城北荒丘上一堂思想教育课，尽管我们怨声载道，但他居然每回都能得逞。因为在校长看来，比起看电影、逛公园、征文之类的纪念活动，席先生的计划最经济节省，既不用请导游又不用买门票。

那地方也确实用不着门票。

去参观的是一片坟墓。从栖镇到县城北转十五里，一路上柳暗花明，水鸟、炊烟还有忽远忽近的杵衣声，如同在一幅明静的水墨画卷里行走。而一旦接近荒丘，气氛就陡然为之一变。风紧了，烟冷冷地发绿，野草森森掩到膝下，枯瘦的松树与荆棘阴沉地站着，鸟和虫的

语言像是诡秘的笑。一大块荒地突兀而起，如一个蓬头垢面的孤寂老人，冷峻地仰对着天空。

它掩埋着三百七十七条生命，这个数字在我们记忆里跟圆周率一样清晰，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席先生几乎复述了无数次。他说几十年前这里的风光其实很不错，这个叫南陂的村子非常偏僻，连县政府的资料里都没有标明它的具体方位。1938年它却赫然出现在侵华日军的作战地图上，并且加注了红圈，据说村东有一座木塔，是日本飞机的导航标志。

抗日战争爆发时，席先生从师范毕业，随着上海和南京相继失陷，他裹在乱民的洪流里一路踉跄逃难，宁波陷落他来到芜湖，芜湖被攻占他躲到南昌，几乎是他跑到哪里日军就攻到哪里。他说那一年日本飞机在头顶一轰鸣，天就像流血似的猩红猩红的，到处是弹坑和废墟，刮在他脸上的风都是灰黑一片。

和他一起出门逃难的姐姐在芜湖被冲散，他辗转到南陂投奔阿舅。然而五天后风声就紧了，栖镇中学敲响了大钟，方圆几里都能听见，他们临时把紧急的钟声改作防空警报，钟声一响，日本飞机就该来了。

村里开始发放难民证。白色的难民证让村里人犯了错误，青壮年大多当了兵或者逃难在外，一群老弱妇孺指望那张纸抵挡日寇的屠刀，等到席先生说服他们疏散时，日军已经堵住了村口。那么一大片黄色的军队连同刺刀的寒光让全村人目瞪口呆，席先生恍惚觉得飘扬的膏药旗上是一滴淋漓的血，不禁两腮发紧。

后来发生的一切不用他讲解我们在电影里也经常看到，他们像当时南京的难民一样，战栗着逃窜着惊叫着，任由一群灭绝人性的强盗践踏蹂躏和宰割。稍有反抗举动的男人通通被绑在木桩上，让日军当靶子开膛练习拼刺刀，其余村民被囚禁在渔户仓库里。席先生和阿舅跳窗逃脱，藏在村边深沟中，隔着茅草他们听见女人声嘶力竭的挣扎，两名日军正拖着一个抱小孩的妇女施暴。席先生说那个叫莲英的女人还给他缝过衣服，眼睛亮亮的会说话。他犹豫着想跳出去，却被阿舅死死摁住。

一个白净的日军突然怪叫起来，他的小指被女人咬断了。“刷”的一声刺刀出鞘，席先生闭上眼睛，耳边有凄厉的惨叫，还有孩子的哭喊。然后他看到两名日军拖起血泊中痉挛的莲英扔进一口深井里，失去母亲的男孩趴在井边哭嚎，日军在狂笑，仿佛欣赏一只蚂蚁在热锅里团团打转。

“扑通！”那个孩子也跟着跳进了井里。

接下来一声呼啸，阿舅抢先跳起来掷出了手里的渔叉，插进井边日军的额头。枪声随之旋风般刮起，他看到阿舅笼罩在子弹网里，打折的四肢抖动着如同一种僵硬的舞蹈。

没等他叫出声，一颗子弹呼啸而来，从肩头穿过，让他扑倒在沟里。

次日清晨他清醒过来，发现一天之内村子竟然从眼前彻底消失了，到处是青烟袅袅的断壁残垣，一座巨大的土丘触目惊心地质地而起。土丘下面是那眼深井。

除了他，全村被杀和被囚的人通通填在井里埋掉。据席先生多年后的统计，无辜惨死的生命有三百七十六条。另一名死者叫宫本雄一，侵华日军高桥联队军曹，被渔叉击毙，系日军为此次血洗南陂付出的唯一伤亡代价。

宫本的墓盘踞在荒丘顶部，上插一段刻有黑色日文的简易木桩，俯压着底部殉葬的三百七十六个中国人。恃强凌弱，以少欺多，一幅侵华战争时期中日对峙的形势图，竟然极其形象地概括在一座坟墓的结构上，让席先生一瞬间忘记了伤痛和恸哭。

他说奇耻大辱！

他说奇耻大辱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满腔悲愤泪光闪烁，在荒丘下面列队肃立，沉重的呼吸惊得青草簌簌作响，一大片压抑的沉默似乎有了沉沉的重量，等待一瞬间的爆发。

可惜年复一年，他讲解的内容始终只有这些。我们的感触也日益迟钝，浓郁的悲情被时间渐渐稀释，大家列队时会自觉地拣一个太阳

晒不到的地方，听席先生毫不省略地把故事从头温习一遍，到处是窃窃私语和东张西望的眼睛。

而他居然毫无觉察，事实上只要接近荒丘他就容易失态，伛偻的腰挺得笔直，深凹浑浊的眼里光芒熊熊燃烧坚冷如铁，像灰烬里不灭的火星。即使他不在这里，那种目光依然无处不在，从树棘草丛某个角落潜游出来，凝结成绝不随便撤退的坚守，绝不轻易抹平的伤痕，绝不伴随时时间退潮的呼啸，让人不自觉地惊悚肃立。

整整四十九年，他就这样目光炯炯地站着，不肯间断地为这座荒坟奔走呼号，反复到政府部门信访，向政协呼吁，请求建立“南陂血案遗址”或者教育基地，统一开展铭记国耻的教育活动……

遗憾的是，除了反复动员自己的学生来参观，他的计划完全没有实施的机会。唯一接近成功的一次大约是 1955 年，县政府终于决定在南陂建一座纪念石碑。栖镇有关部门赶紧在荒丘周围补栽松柏，并且修了一条路，准备方便人们日后参观教育基地。

出乎意料的是，所谓的纪念碑只是修了一个不太高的石柱，刻了一行字就草草收场。那条足以容纳浩浩荡荡参观人群的大路，没有任何想象中的喧闹就直接陷入了荒芜，野草逐渐蔓延，只有色彩斑斓的蜻蜓在草尖停伫不动。在那样一个崇尚斗志昂扬战无不胜的年代，荒丘难免会成为一种尴尬的存在。毕竟，三百七十六人牺牲，只击毙了一个日军，论抗战的意义不如平型关大捷，就算是纪念国耻也远不能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相提并论。

至于附近的村民，对这条路和石碑也提不起兴趣。县人民政府曾经尝试恢复南陂的建制，动员了好几回，却没有一户人家愿意搬迁。他们说这里阴气太重，蛇虫又多，天黑雨湿的时候能听见鬼语啾啾。好在地方宽阔，倒是个理想的墓地。结果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荒丘周边的新坟越堆越多，残碑断碣，在苍烟落照下躲避着人群，由寂寞归于宁静，像一个避世隐居、满脸皱纹的老人，淡漠地打量着世间的一切。

席先生也老了。清明时分络绎去荒丘扫墓的茶农都亲眼看到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凋零得像一棵深秋的树。他们都知道这个老头脾气很怪，守着一个坟墓，不上香也不焚烧纸钱，就那么执拗地站着，偶尔叹息一声，望着东方。

他是否看见，东方另一个安置战争亡灵的地方正香火缭绕热闹非凡。靖国神社，一个不大的院子修得庄严肃穆，上百万日本军人曾经以此地为起点，挥刀前进，一度把亚洲和太平洋拖入血雨腥风，死后又聚在神社祭祀。那里也是执拗的，就算是被侵略国家政府和受害民众的抗议多如潮水，然而从政客到平民全部衣冠楚楚，昂着不肯轻易服输的头，凛然而虔诚地折服在神社台阶下。台阶上十四名甲级战犯和二百五十万个战死者牌位上下有序，排列整齐，傲骨铮铮，好像还等待着某种重新出发的指令……

三

在我想记叙这座坟墓和席先生的时候，还能记住他的人已经很少了。我的母亲曾经在席先生的阁楼上住了好多年，后来在一所著名的医科大学做了一阵勤杂工，见过许多白发苍苍风度翩翩的专家教授。她说：“席先生能活到现在就好了，他是个真有学问的人，精通数学，懂三国语言，对国家多有用啊，就是被那座坟耽误了。”

正如母亲所说的，席先生确实很有学问，他仅仅念过师范，却熟知英、俄、日三门外语，全部是业余自学的。多少老师背熟一份教案则此生足矣，唯独席先生孜孜不倦，不论什么书，《资本论》也好，《堆垒素数论》也好，只要能找到都反复通读，边读边做笔记。

在我的童年时代，栖镇经常流传席先生读书闹出的笑话。据说席先生最怕夜间停电，而栖镇当年是经常停电的，他的希望就维系在一盏煤油灯上。有一天半夜，灯油耗尽，他抛下书上街买煤油，供销社早已关门。席先生如困兽般急得团团转，突然发现西街一家的门缝透出烛光，一对姐妹凑在烛光下绣枕巾。席先生黑影憧憧地闯进门，不由分说丢下五角钱夺过蜡烛就跑，把绣花的女孩子吓得连声尖叫。他

跑回家一头扎进中断的自学里，丝毫没有意识到刚才的行动会吓着什么人。

然而他如此勤学苦读却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哪怕是一篇有价值的论文。那座坟墓把他最富有创造性的年华消蚀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里。先是 1957 年，他因写万言书，反映荒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被划为右派，从教师降为敲钟的校工。接着是文化大革命，又冒出一个石碑事件，这回连钟都敲不成了，受罚扫了一年大街。

所谓石碑事件是指他私自以政府的名义给荒丘建造纪念碑。如果能够完工，那块石碑倒可能是他留在世上的唯一作品。在我印象里，荒丘前面根本没有墓碑。按席先生的叙述，墓前最早插有日军刻的一段简易木桩，仅有一行“昭和殉难军曹宫本之碑”的黑色日文，而殉葬的三百七十六个中国人则一笔省略。抗战胜利前夕，席先生返回南陂，带人挖出木桩烧了，把宫本的坟墓从荒丘上方迁到右侧。差不多十年后，县政府才在木桩原址建起一座“南陂血案遗址”纪念石碑，石碑反面镌刻了几行简单的文字，大半是号召人们勿忘国耻、努力奋斗、建设新中国的标语。被屠杀的村民依旧没有姓名，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更没有历史细节。

建造那块石碑的人绝不会想到，日本人在展示自己的战争创伤时精细到了何种地步。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堪称是四两拨千斤的杰作，除了详尽的论述和一串串数字，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无声的细节——一块水渍斑斑泛黄的怀表，指针永远停在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刻：八时十五分。

一架儿童骑的玩具车，在高温中熔化了一大半，像一只瘦骨嶙峋的小手，不畏沧桑的剥蚀，顽强地伸向当年的主人。

还有一块花岗岩，原是一家银行门口的台阶。原子弹爆炸的瞬间，一个银行职员倏地蒸发了，只在台阶上留了一个模糊的影子……

不要说这座偏僻的荒丘，被日寇蹂躏了半壁河山的中华大地，又有多少类似“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纪念物呢？可就算是这样一块粗略的纪念碑，也没能长久地保存。起初它被放牛的孩子用作拴牛的石桩，

大跃进期间掀起全民炼钢热潮，荒丘附近的农民发现石碑下有固定底座的钢筋，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钢筋撬走，让石碑轰然倒塌。

席先生见到毁弃的墓碑后一度濒临崩溃，他一路狂奔冲进学校把大钟敲得震天响，把正在上课的校园敲得乱成一团，整个栖镇都回荡着愤怒的钟声。他足足敲了一刻钟，如果不是校长清醒过来指挥学生把他抓住，还不知要敲到什么时候。

他声嘶力竭地嚷，记住！你们记住！这是空袭警报！

大概从那一天开始，他一直想让纪念碑重新树立起来，并为此奔波了十多年。直到退休前他才醒悟到，一切只能靠自己动手。

他动用全部积蓄到西峰山买了一块巨大的石材，请了两个在南陂血案中失去亲人的石匠，端端正正刻上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详细记录血案发生的经过，并且镌刻了三百七十六个中国村民与那个日本军曹的名字——这些姓名是他上访前走遍附近三区四县访查求证出来的。刻写宫本的姓名时，石匠有些犹豫，要不要把这个名字省掉？

席先生答，不省。

1975年，政治运动依旧暗流汹涌，他们只能躲避着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幽灵一样在坟区挑灯夜战。与他们行动类似的是二战后关在南洋的日本战俘，暗中策划用浸染日本军人鲜血的石料，为死去的将领与士兵建墓碑。战俘们躲过英军的监视，夜间秘密行动，最终竟然使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将领寺内寿一的墓碑在新加坡傲然挺立。如果历史镜头可以切换一下，时隔三十年的两个夜晚实在有某种惊人的重叠：血汗交流的手臂，警觉的耳朵，星光下惊惶而虔诚的眼睛……

可惜，他们实在不如日军战俘那么幸运，纪念碑尚未完工即被革委会破获，成为右倾翻案的石碑事件，结局是席先生被审讯后勒令扫街，石碑则让石匠们自己砸烂，填了防波堤。

席先生去世后，那两名石匠倒是想过把石碑再建起来，当初收了工钱却没把活儿干完，内心总有些不安。不过，最终立碑的事依旧没有着落。想来理由也很简单，他们都老了，动员孩子们干吧，肯定会

遭遇异口同声的反对：谁付工钱？况且席先生耗尽精力搜集的死难者姓名连同墓志铭早已失散，谁知道白茫茫一块石头上该刻些什么？

四

席先生自己的墓在栖镇南桥外，与荒丘距离遥远。按栖镇中学朱校长的意见，席先生应该葬在荒丘附近，但席先生的女儿不同意。她说：“他在那个地方太难过了，让他在别的地方休息一下也好。”

沉默片刻，她又补充了一句：“真的，他不是为了仇恨，他只是很孤独很难过。”

也许，她是对的。

席先生曾经非常钦佩地提到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家永三郎。这位东京教育大学教授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因为记载了日军近代的侵略史实而被文部省审定为不合格。从1965年开始，家永三郎发起“教科书诉讼运动”，控告日本政府隐瞒历史真相。这场诉讼历时三十二年，消耗了家永三郎后半生的精力。面对国内外的强烈抗议，日本政府终于稍加收敛，一度消失了二十多年的“南京大屠杀”和“731细菌部队”等史实才允许出现在部分历史教科书上。

“这是一场一个人对国家的宣战。”席先生对我们感慨道，“这样勇敢面对过去的日本人很了不起！家永三郎先生打完官司已经八十三岁，体重只剩下三十八公斤。”

那是他去世前一年最后一次带我们到荒丘参观时讲的故事，内容大概是从收音机里听来的，他当时的体重比家永三郎也强不了多少，白发萧萧，被子弹穿透的右肩会不由自主地哆嗦，眼里噙了一线荡漾的光。因为一个日本朋友真诚地直面过去，所以他发自内心地谅解和感动。真的，他的要求其实并不多，就像陈毅元帅对日本人说过的——那段历史过去了，只要日方认识了，我们就可以忘记；日方不能认识的话，我们就忘不了。

问题是日方认识到了吗？当年制造血案的日军，对自己战败后服役的苦难倒是从未忘怀，那么多人不远万里到西伯利亚到澳洲故地重游，却没有一个人到荒丘前忏悔。政客们迫不得已时也在口头上表示

反省，又遮遮掩掩很不情愿，入侵十四年，杀戮三千万，轻描淡写表示一句遗憾或者“增添麻烦”了事。再要抗议干脆恼羞成怒，连“麻烦”都不愿意说了，将“侵华战争”篡改为“进出中国”——你们当初是坐着民航客机来观光旅游的吗？

是的，日方不能认识的话，我们就忘不了。可是他们没有认识，我们就真的没有遗忘什么吗？

差不多在席先生走了半年之后，我转到南浦中学，正赶上教导处组织学生看电影。影片是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屠城血证》，剧情粗糙但足够血腥。我很清楚地记得，坐在我身后的两个同学边看电影边争执不休。他们争执的焦点是两名日军为赌一瓶酒在南京展开屠杀比赛，冠军到底是杀了一百零五人还是一百零六人。他们仿佛毫不在意被杀掉的人，只是为半个世纪前的屠刀下血淋淋的细枝末节争执得津津有味，是不是也在赌一瓶饮料？我知道那两名日军叫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他们完成屠杀游戏后留下了一把军刀，上刻“南京之役杀 106 人”。这些席先生都曾在荒丘前讲过，但我没有席先生拍案而起的勇气，事实上念初二的我相当纤弱怯懦，我只敢藏在黑暗里重重地咳嗽一声，让他们的争执有片刻的中断。

那一刻我的确有些难过，为自己的表现，也为了席先生。我们曾经那样厌烦他的说教，可是他呼号了四十多年又唤醒了几个人？

我碰到的那两个同学还算是比较文明的，此后不久报纸上又登载了一则新闻，说某影院放映《屠城血证》，几个年轻人边看电影边骂导演差劲，嫌日军强暴中国护士的镜头不够刺激，让邻座的一个老人震怒不已，挥拳猛击。于是银幕上日本兵杀中国人，一片惨象，银幕下中国人互相殴斗，四处狼藉。我不止一次地猜想，如果席先生在场又会如何？他是准备向那位老人深深致敬，感谢他那一拳打出了中国人应有的愤怒，还是又跑到学校里敲那口大钟？他高喊防空警报的时候，很多人怀疑他快疯了，有谁知道他其实是怎样的焦虑、无奈与孤独。

但一切也仅是猜想而已，那个时候席先生的墓地已经与荒丘一样缩在荆棘丛中，默默地面对着半江渔火一枕清霜。

五

我最后一次见到荒丘大约是 1993 年。

我陪母亲回到栖镇探亲。分别不过一千多天，站在长街上我忽然有了迷路的感觉，老巷、石桥、街檐下穿梭的船、细雨淋湿的樱桃，变成了摩托、广告和贴瓷砖的洋楼，眼前就像一台失控的电脑，不容分说用一幅花里胡哨的卡通画把原来的画面替换掉了。

在街上碰到当年的宋团支书，她说你要到南陂看看，说不定会更吃惊。我当真去了一趟南陂，还是当年的松柏野草，风冷烟轻，不同的是多了一条路。细看，正是荒芜多年的那条路，突然就铺了石级，曲曲折折通往茂林深处，带着几分气派，几分诡异。

路的尽头居然是一座干净漂亮的小莹园，通红的枫叶，青岩铺就的甬道，一座光润的黑色大理石碑。

看到碑文的那一刹那，我的血液几乎骤然凝固。

宫本雄一之墓！

我慌忙寻找荒丘的方位，就在莹园左侧，岁月的流逝把一座巨大的土丘消蚀得毫不起眼，没有墓碑，没有鲜花，还是一身怒放的荆棘。

事情的起因很快就摸清楚了。去年乡政府收到一封有关部门转来的公函，大意是一位姓宫本的日本商人，寻访其伯父宫本军曹的遗骸，准备迁往日本安葬，盼当地政府予以妥善接洽。很快乡政府掌握了一条更重要的资讯，那位日本商人不仅是来迁坟的，而且有可能对当地进行投资考察。

乡领导精神不禁为之一振，和栖镇周边地区相比，这里发展明显滞后，有百分之一招商引资的可能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他们去看了宫本的墓地，仅剩一坯黄土。经过讨论，乡里决定赶紧重新修路造墓，方便外宾考察。

修墓的工程承包给了几个石匠组成的建筑队，石匠们连夜开工、铺路、树碑，把军曹的墓修得像模像样，以至于衬托得一旁的荒丘无

比寒酸。要不要顺便也修葺一下呢？乡里反复计算所需费用，资金紧缺，村小学、敬老院、医疗所都等着维修，哪一处都比荒丘重要。反正给外宾看的项目可以交差了，自家人的坟墓马虎一点不要紧。

事实上，他们的算计毫无差错。日商宫本看到莹园后非常满意，不仅放弃了迁坟的打算，还投资办了一座无纺布加工厂，现在它已经成了支撑当地经济的龙头产业。

只好委屈荒丘了。新旧两座坟墓，隔着一条路，隔着一级不太宽的石级，贫富对比极其鲜明，一如半个世纪前的强弱对峙。历史与发展的课题，悄悄地在这里定格，简直像一个浓缩的寓言，把一切概括得让人难以置信。

六

所幸席先生看不到这一切。

他死于 1987 年 4 月 29 日夜间，因为骤然激动导致心肌梗死。

十七年后的夏天，我翻阅《青年参考》上一位叫 Gamst Bery 的挪威人的文章。她曾在一家日式风格的卡拉 OK 店做领班——这间店设在中国，服务员也全是中国女孩。一天晚上来了一群喝得醉醺醺的日本白领，边喝酒喧哗边播放录像。她惊讶地发现那不是普通录像，而是一部日本侵华战争的黑白纪录片。影片中的日军正瞄准中国平民射击或者投掷炸弹，那些日本白领则伴随着日本军歌的节奏扭来扭去。如果这一幕发生在欧洲，有德国人敢在酒吧里观赏纳粹影片，绝对会有人报警或往肇事者脸上泼酒。

然而那些陪酒的中国女孩们居然跟着哈哈大笑，猜拳喝酒。整家酒吧只有这位挪威人愤而离去，辞掉了工作。

我的手猛地将报纸抠出了一个洞。蓦地，一个大胆的设想让我的心不规则地一跳，我想起席先生临终前看过的报纸，外婆费了好大的劲才从他手中取下来，上面也抠了一个破洞。

如果我猜想得不错，他当时应该是读了一则类似的新闻，在剧烈的晕眩中挣扎了好久，最后他像被什么东西悄然击中，无声地仰倒在黑暗里，那盏昏暗的路灯也随之熄灭，远处依稀钟声响起。

十七年后的这个夜晚，我仿佛听到那沉闷的钟声又敲得轻轻一响。
我蓦然回首，耳边流过的只有一去不回的晚风。

月光水井

曾小春

一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特别是外婆很疼爱我。
但我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只有细锅太太对我冰冷得像根冰棍呢？

细锅太太是个孤寡老人，住在上街的一间木板房子里，几乎每天都在门前骑楼下架起一口小锅，烧油炸米果卖。

母亲第一次去下街餐馆做临工那天，要我跟她一起去，知道她做事的地方。经过上街时，看到不少小孩围着买细锅太太的米果，便赖着要母亲买。母亲说，那东西脏，吃了肚子痛。细锅太太拖长了声音说，乱说话是会烂嘴角的。说着飞快地瞥了我们一眼，那眼神锥子似的尖锐，让我不寒而栗，也让我对母亲不快。我觉得母亲说了假话，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孩子争着买细锅太太的米果呢？

也许，母亲是为了省钱吧？

很快就到了那个餐馆。

母亲说，小从子，你回去吧，去外婆那里玩，有什么急事可以来这里找我。

看到母亲踏进餐馆大门，我就回去了。再次路过上街时，我瞄着细锅太太和她的米果摊，重重地看了一眼。

回到家，父亲刚刚起床吃早饭。他是村干部，晚上经常开会，回家往往深夜了。我说我要吃细锅太太的米果。父亲愣了一下，随即塞给我五块钱，神色有些紧张地说，你自己去买，只是不要让你娘知道了。

他是怕母亲责怪他给我钱吧？我擎着钱一路飞奔而去。

细锅太太看也不看我，她拿着一双长筷子拨弄着刚刚下锅的米果说，不卖，我的米果吃了会肚子痛！

我不怕！我扬着手中的钱说。

你不怕我也不卖给你。细锅太太低垂着眼，用手中的筷子敲着锅沿说。

我买啊！我几乎大喊起来。

就是不卖给你，你想吃就自己拿了吃。她争得脸都红了。

我吃惊了，半晌才问，你是说，你白送我吃？

嗯，你敢吗？细锅太太紧盯着我的眼说。

我认真地想了一想说，不敢！我娘说不要乱吃别人的东西。

你娘？

嗯，我娘！

她仰脸凄切而轻蔑地一笑说，真是教育得好！

我依然迷惑不解，问她，你怎么卖给别人不卖给我？

没有什么为什么，有本事叫你爹来买。细锅太太冷着脸说完，就不再吭声了，把我晾在一旁。

我爹怎么……我急着问。

你去问他呀！她伸出一条枯黄的手臂指着我来的路。

我垂头丧气回到家里。

父亲正准备出门，笑嘻嘻地看着我问，米果好吃吗？

我把那张钱扔还给他，却被父亲抓住了手。

没卖了？他关切地问。

人家不卖给我，还说去问你。我气鼓鼓地回答。

哦，这样啊。父亲无奈地苦笑。

你是不是得罪人家细锅太太了？我摇着他的手问。父亲做村干部多年，得罪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是啊，是啊。父亲不耐烦地站起身来，甩开我的手去村部了。

二

父母白天在外，我家的大门经常紧闭着，我便成了一个过家门而不入的孩子。有时回到家里，竟觉得有些陌生，好像不是自己家似的。

不过，家里没有人的日子我早已习惯。我没有见过爷爷奶奶，从小跟着外婆长大。外婆住在几百米远的米巷子里，三两分钟就能走到。

我在外婆家玩，午饭也就顺便在那里吃。外婆清瘦高挑，虽然年过六十，门牙已经掉光，但皮肤依然白皙，神情分外安详。只是我有些怕舅公，他老实固执，脾气也大。搯菜的时候，我发现舅公老是眼光凶凶地瞄我，心里便打起鼓来，只敢夹一点点菜。外婆有时察觉了，就拿起菜碗往我饭碗里拨拉，示威地说，小从子，多吃点啊！舅公有些脸红地说，多吃点多吃点！

午后是一段无聊的时光。我不习惯午睡，又无处可去，闲逛一阵后，最后去了井边。

镇上的水井有四口，它们分布在镇子的四周边缘，就像镇子的眼睛一样明亮清澈。其中有三口井是深井，井水幽幽地藏下面五六米远的地方，是不能轻易看见的。它们的井口都是圆形的，高出地面半个胸脯。这样的水井看上去很美，但取水很不方便，要专门带上系有长绳的小吊桶。唯有我常去的那口井是方形的，像口小池塘，平时总是满盈盈的，也不必备用吊桶，担钩挂上水桶能直接从井里打水上来。更特别的是，井台上筑了一座圆形的亭子，檐角翘翘的，将方井整个给罩住了。井台上红条石的色彩深沉又鲜活，这是井水年年滋润和人们代代踩踏的结果。这口井就靠近上街片，包括我家和外婆家在内的百十来户人家吃的都是这口井里的水。

我无法不喜欢这样的水井。

如果是夏天，我不光是去看看，还会拿着系有细绳的玻璃瓶子，坐在井角吊水喝。我觉得，同样是井水，自己吊起来的瓶装水更加甘甜爽口。

而且，去井边还会遇上一些有趣的人和事。我曾看见一个刚学挑水的少年失足掉进了井里，看见有人提水的时候木桶猛然解体，桶板和桶里的水哗啦一声洒回井里。还看见一些挑水的妇女和少年由于力气不足，提水的时候，木桶紧贴着井壁，桶上的铁箍被挂落沉入井底，井水从桶的缝隙中喷射而出。他们有些狼狈地挑着漏水的担子跑回家去，扛来长柄的二指叉，去打捞那道乌黑的铁箍。如果去得晚了，就有小孩趁火打劫，抢先将那铁箍捞了去当铁环滚。